

社会支持理论视角下生活困难家庭 青少年的帮扶需求研究

■ 李燕平 马玉娜 文思君 高雅娟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社会工作系 北京 100089; 共青团北京市海淀区委员会 北京 100086;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街道办事处 北京 100083)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大部分家庭已经进入小康,但尚有部分贫困家庭存在。长期持续的贫困容易使青少年产生一些外化问题和内化情感障碍,经济拮据会使青少年在教育、就业、健康、个人发展等方面面临困境。家庭是生活困难青少年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也是其接受其他社会支持的重要中介。从社会支持的内容来说,来自家庭的支持主要涉及行动支持和情感支持;来自社会系统的支持主要是行动支持,基本满足了青少年对日常生活照料的需要和教育需求。当前,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系统,对青少年的支持都明显不足,尤其缺乏对青少年人生规划、学业发展、求职就业等方面的认知支持和指导。共青团针对生活困难家庭青少年的帮扶工作应该以贫困青少年的需求为导向,着力打造家庭、社区、学校、社会相互协作的青少年社会支持服务平台,弥补贫困家庭在社会支持方面的不足,促进青少年的积极发展。

【关键词】社会支持理论 生活困难家庭 青少年 共青团工作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19.02.015

截至2018年5月份,我国共有低保家庭2791.9万户,有4965.9万人领取低保,其中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692.8万户,1167.8万人领取低保^①。2016年6月,共青团北京市委、北京市民政局共同印发了《关于北京共青团助力生活困难家庭青少年精准帮扶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各级共青团组织要不断创新服务青少年的方法和手段,促进生活困难家庭青少年(帮扶对象)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②。可以看到,脱贫攻坚工作任重道远。

收稿日期:2019-01-31

作者简介:李燕平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 心理学博士 主要研究青少年心理与发展、青少年社会服务理论与实践;
马玉娜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系讲师 哲学博士 主要研究反贫困与实践、青少年社会服务与政策;
文思君 共青团北京市海淀区委书记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共青团组织建设、青少年权益保护、公共政策;
高雅娟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工商管理硕士 主要研究中学共青团组织建设、青少年权益保护。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海淀区团委课题“海淀区困难家庭青少年精准帮扶需求研究与对策”、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课题“贫困青少年发展资产及社会工作介入研究”(课题编号:6660501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低保数据 <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yb/qgsj/201804-12/20180506280947.html>

② 在共青团北京市委、北京市民政局印发的《关于北京共青团助力生活困难家庭青少年精准帮扶工作的实施意见》中,对帮扶对象(生活困难家庭青少年)的定义为“享受本市最低生活保障、生活困难补助和特困人员供养家庭中25周岁以下(1991年1月1日后出生)以下的青少年。”这也是本文对“生活困难家庭青少年”的界定依据。

已有的研究显示,经济拮据会使青少年在教育、就业、健康、个人发展等各方面都面临困境^[1]。长期持续的贫困经历,容易使青少年产生一些外化问题和内化的情感障碍,(如孤僻、自卑、冷漠、敌意等)^[2]。同时,由于缺少父母的支持和指导,生活贫困青少年社会能力(包括自我管理、冲动性以及儿童社会情绪能力有关的其他能力)也比较欠缺,与父母沟通和交流的情况普遍较差,社会参与较少,自豪感、外显自尊心显著低于非贫困生,在消极情绪、人际敏感、抑郁、强迫倾向等方面的得分明显高于非贫困生^[3]。值得注意的是,家庭贫困不仅影响着个体当下的认知行为和情绪健康,而且对个体未来的生活也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如受教育水平、经济能力等)极易导致贫困的代际传递。调查数据显示,贫困家庭青少年中接受大专以上学历的比例明显低于普通家庭,在接受大专以上学历的青少年中,贫困家庭占39.9%;普通家庭占60.1%^[4]。较低的受教育水平严重影响贫困家庭青少年未来的市场竞争力。已有的研究发现,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存在就业率低、收入低、升迁机会少的现象,而导致上述就业问题的两个主要原因就是贫困青少年的工作经验少和学历低^[5]。如何减少经济贫困对青少年发展的负面影响,是脱贫战役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之一。

早在20世纪70年代,国外的研究者们就发现,良好的社会支持对个体发展有着积极作用,可以帮助个体更好地面对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或危机,保持身心健康^[6]。社会支持在负性生活事件和抑郁症、紧张情绪、攻击性之间可以起到缓冲作用,能够维护个体的心理健康^[7]。无论个体是否处于压力状态,只要增加社会支持,对个体都是有益的^[8]。国内的一些研究显示,农村留守儿童所获得的社会支持,如同伴支持、与抚养人的沟通情况、与父母的团聚频率等,对抗逆力有着积极作用,女生在社会支持利用度方面明显优于男生^[9]。

综上可知,社会支持对青少年的积极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于生活困难家庭的青少年来说,获得充分有效的社会支持是降低经济贫困负面影响的一个有效途径。不过,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大多通过定量的方式考察社会支持总体水平与个人发展之间的关系,而缺少对具体人群的社会支持内容及特点的剖析,这种抽象的变量关系研究无法为社会服务实践提供有效的设计依据。因此,本研究以生活困难家庭的青少年为访谈对象,深入剖析生活困难家庭青少年所获得的社会支持内容及特点,为精准帮扶政策的制定和共青团服务实践提供有效的实证依据。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目的抽样的方法,在北京市海淀区团委和社区居委会的协助下,从海淀区14个街道中抽取了不同年龄段生活困难家庭青少年共19人进行访谈,其中男生11人,女生8人;小学生2人,初中生7人,高中生3人,职高2人,本科及大专在读2人,毕业3人。在被访的19名青少年中有5个单亲家庭,其中2个青少年被母亲遗弃^①,1个青少年被父亲遗弃。有11个家庭的致贫原因是青少年的监护者患有身体疾病或精神疾病,有8个家庭贫困的原因是劳动收入较低无法支撑生活支出(见下页表格)。

2. 研究方法

笔者采用一对一的方式对19名生活困难家庭的青少年进行了访谈,着重了解了访谈对象

^① 这里“遗弃”指的是与父母一方长期没有联系,自从父母离异(其中一个被访者父母没有离异,但母亲离家出走)后,基本没有见过离开的家长(父或母)。

的日常学习和生活状况,在学习、就业及未来规划中的家庭支持、同伴支持和社区社会支持等情况。在事先告知并得到访谈对象允许的情况下,对所有访谈均进行了录音,每个访谈对象的访谈时间为60-90分钟。

3. 访谈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笔者将搜集的有关19位青少年的访谈录音转誊成逐字稿,包括受访者的言语及非言语信息,并结合笔记上的线索对逐字稿进行补充,形成转录文本。然后,在此基础上阅读筛选与研究主题相关的材料,在对访谈资料进行汇总后,选取其中相关的主题。将一些不够完整的主题合并、拆分或删减,使主题达到内部同质性和外部异质性标准,尽量做到互斥和饱和,充分体现材料的内容。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表

编号	年级	性别	家庭结构	共同生活者	贫困原因
X4 - XYN - G	小学四年级	女	完整	父亲、母亲	父亲残疾,母亲无工作
X5 - CSB - B	小学五年级	男	单亲,母亲遗弃	父亲	父亲非本地人口,收入低
C1 - TJQ - G	初一	女	单亲	奶奶(父亲不住在一起)	父亲患有精神疾病
C1 - HJY - G	初一	女	完整	父亲、母亲	父亲吸毒,患有严重肝病
C2 - ZRY - B	初二	女	完整	父亲、母亲	母亲患有精神疾病
C2 - LY - B	初二	男	完整	父亲、母亲	父亲为刑满释放人员,家庭收入低
C2 - WZP - B	初二	男	完整	父亲、母亲	母亲患病,父亲收入低
C3 - XY - B	初三	男	单亲,母亲遗弃	父亲	父亲残疾,无收入来源
C3 - YYH - B	初三	男	完整	父亲、母亲	家庭收入低
G1 - QY - B	高一	男	完整	父亲、母亲	家庭收入低
G3 - ZJY - G	高三	女	完整	父亲、母亲	家庭收入低
G3 - XWY - G	高三	女	完整	父亲、母亲	家庭收入低
ZG3 - ZXY - B	职高	男	完整	父亲、母亲、姥姥	母亲为盲人,家庭收入低
ZG3 - GRL - B	职高	男	完整	母亲	父亲患病,在疗养院居住
DZ - TC - B	专升本在读	男	完整	父亲、母亲	家庭收入低
DB - ZN - G	大学本科在读	女	单亲	父亲、奶奶	父亲患病,无经济收入
ZG - YL - B	职高毕业,已就业	男	完整	父亲、母亲	父亲、母亲均患有残疾
DZ - TY - G	大专毕业,无业,暂时在做微商	女	单亲,父亲遗弃	母亲、姥姥	母亲残疾,无收入来源
ZG - LZ - B	职高毕业,无业	男	完整	父亲、母亲、爷爷	家庭收入低

二、研究发现

本研究中,笔者主要采用了Caplan的观点,将社会支持分为提供有用的信息或认知指导(包括提供信息、建议、指导等认知层面的支持)、情感支持(包括关怀理解、精神支持)、实际帮

助(包括金钱投入、物质帮助和行为支持)三类,简称为认知支持、情感支持、行动支持^[10],并从家庭、社区、社会层面对生活困难青少年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状况进行了分析。

(一)家庭是生活困难青少年最主要的社会支持来源

本研究发现,家庭是青少年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生活困难家庭的父母对子女的支持主要体现在行动支持和情感支持两个方面(如日常生活照料、经济投入、精神激励等),而在认知支持方面则比较薄弱,关于人生规划、学业发展、求职就业等方面的有用信息提供和认知指导比较少。

1. 家庭专注于对青少年日常生活的行动支持,而缺乏教育方面的行动支持

访谈中,大部分青少年反映父母对自己的日常生活照料比较周到,能够满足基本的需求。“我到家的時候,(我妈)就把热乎乎的饭端上桌了”(被访者 ZG3 - GRL - B)。(家里的经济压力)我感受不到,但是我觉得肯定是有的……反正我要什么都给买,反而自己会斟酌一下……从来都没有拿钱这种东西压过我”(被访者 DB - ZN - G)。

不过,由于家庭经济窘迫、忙于生计和自身文化程度的限制,生活困难家庭的父母在子女教育方面的行动支持总体偏低。不仅在教育方面的“硬件”投入比较少,而且“软件”保障也跟不上,生活困难家庭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就学业方面展开的交流和指导非常有限。一些家长对低年级子女的学业比较关注,主要表现在检查作业、监督学习、尝试采取一定的奖惩措施来激发孩子的学习积极性等。“我们自己定了一个‘奖学金,名次每提五名的话,(父母)就奖励我做一次好吃的,我们自己做的烧烤……如果我后退了会惩罚我做习题。”(被访者 C2 - WZP - B)。但是家长们对孩子学习方法的指导普遍欠缺。“不会跟我说你要总结总结,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要怎么总结……就只能说自己学”(被访者 DB - ZN - G)。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家长自身能力的限制使得他们不得不放弃对学业的监管,主要交由孩子自己做决定。“上职高之前都是把我压得死死的那种,就是让我学习嘛,然后限制我娱乐什么的……反正我感觉越是那种死逼着学习,我越学不进去,开始有点排斥。自上了职高以后就开始,最低限度是及格”(被访者 ZG3 - ZXY - B)。

国外的研究发现,较高的教育期待对个体的积极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不过,本研究发现贫困家庭的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待总体偏低。尽管大多数被访青少年的父母都希望孩子好好学习,“能读到哪儿就一直读下去”,但在进一步的追问中可以发现,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期待实际只停留在“拿个大学文凭就可以了”,甚至一些家长或多或少传递出学历不是很重要的观念。“在学习方面(爸妈的)期待就是正常发挥呗……我妈的意思是让我先去上班,先挣钱,然后一边挣钱一边再上大学(夜大那种),我爸的意思是让我直接赶快把大学上了……就看我自己了”(被访者 ZG3 - ZXY - B)。“反正我父亲对我的要求,就是别把我们家这边有一些物品啊,什么家当败在我手里就行,这是最低要求”(被访者 C3 - XY - B)。这种较低的期待给青少年的学业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本次访谈的青少年中,处于后义务教育阶段的有 10 人,其中仅有 3 人在普通高中就读,1 人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本科,其他 6 名青少年中有 2 人在读职业高中,2 人职高毕业,1 人由职高转本科,目前专升本在读,1 人为大专毕业。也就是说,有一半以上的被访青少年在初中毕业时选择上职高,之后一部分青少年会进一步通过进修拿到大专或本科学历。他们总体学历起点较低,就读的学校也比较差,这种较低的学历教育水平将会导致他们在未来的就业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进而影响其就业。在本次访谈的 3 位毕业生中,就有 2 人处于无业状态,且无业均在 1 年以上,并且没有从事一份稳定工作的经历。本研究的这一发现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存在受教育程度低、就业率低、收入低、升迁机会少的现象,工作经验少和学历低已成为限制贫困青少年就业的两大障碍^[11]。

2. 生活困难家庭父母提供更多的是情感支持

本研究中,大多数被访对象表示自己的家庭关系和谐,在家庭生活中能够得到温暖和关怀。

“我觉得我们家主要是言语上的鼓励,就是精神上的理解,就是说那个,嗯,好,不错,有梦想,去做吧”(被访者 G3-ZJY-G)。“我爸我妈在我的印象里几乎没吵过架,我觉得有的话好像就是在平和的沟通中解决了。然后,我觉得我在处理和别人的关系上,或者怎么着,我也会学习这种方法”(被访者 G3-ZJY-G)。

生活困难家庭父母对子女的情感支持的另一个重要体现是对未来拥有积极的信念。国外的研究显示,长期的贫困可能在贫困家庭及其子女中形成一种“贫困文化”,导致贫困青少年对未来不抱有希望,行动缺乏长远规划,得过且过,放弃改善自身处境的努力。笔者认为,目前在我国的贫困家庭中尚未出现这种“贫困文化”。在本次访谈中,多数青少年认为,他们的父母相信“努力可以改变命运”,并鼓励他们努力学习和工作。“他只是用一些道理让我明白,让我更好地去面对……就是让我振作起来,好好学习”(被访者 C3-XY-B)。困难家庭的父母和青少年均表现出“相信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只要有手有脚,去努力工作,人都不会饿死……你想得到什么样的生活,(就)自己去奋斗,去努力。”(被访者 ZG-YL-B)。已有的研究显示,这种对逆境的积极信念能够促使个体更好地适应环境,心理弹性更高,同时可以减少问题行为(包括反社会行为和药物滥用)的发生^[12]。

3. 缺乏对青少年学业和就业方面的认知支持

维果斯基认为,儿童的发展有两种水平:一种是儿童的现有水平,指独立活动时所能达到的解决问题的水平;另一种是儿童可能达到的发展水平,也就是通过教育所获得的潜力。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是“最近发展区”。如果父母在抚育儿童的过程中,能够有意识地着眼于“最近发展区”,通过适当的活动和谈话等方式,促使儿童发挥其潜能,就能够促进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

访谈发现,生活困难家庭的父母对子女的认知指导主要体现在生活方面:即将自己的人生经验传递给孩子,协助他们处理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朋友有矛盾时)我妈会开导我呀,因为这些事她早就遇到过了,(她会说)这些其实都是小事,然后她会告诉我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会经常跟她说我跟我朋友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她可能就会指点一下”(被访者 DB-ZN-G)。“我妈会很直接地告诉我问题出在哪儿,应该怎么去做……我爸现在不愿意过多地去跟我讲什么道理,他更多的是把他的经验,他在社会上的一些经验,包括他做的一些事情,好事也好,坏事也好,挫折也好,把他的经验告诉我”(被访者 G1-QY-B)。

不过,由于生活困难家庭父母自身能力的限制,他们无法随着子女发展阶段的不同,及时提供与其成长相适宜的信息和认知指导。例如,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在学业、就业和人生规划等方面的指导需求日益突出,生活困难家庭的父母则表现出不能胜任的特点。“我不喜欢问他们(学习的问题)……跟他们沟通费劲,他们老是较真,就是把一个问题抠得特别死……(跟父母)没有聊过就业的问题,我觉得没什么可聊的……(他们)没有陪我做过职业规划之类的……(现在还在上学)这些事没有一个具体情况的话,也没法沟通”(被访者 C3-YYH-B)。“我妈妈就是从小到大都没摸过课本,根本没管过我学习……小学的时候就是我奶奶看着我写作业啊什么的,之后也就都不管了……我当时说想考首师大,(我妈)说那你就努力啊……想学哪个专业,她都是听我的,像那种报志愿,她都没有参与,都是我自己报的。”(被访者 DB-ZN-G) (“学习方面)我爸对我基本没有帮助,他虽然略懂一些,可是如果跟我来谈教育方面的事,他还是不行的,学习还得靠我自己……我跟我爸谈其实也是多此一举,有什么事还不如直接跟老师谈……因为跟他谈论这个(爸爸),他也解决不了,”(被访者 C3-XY-B)。“我跟他们(父母)的那个学识也不一样,所以说在找工作方面,其实(父母)只能说提醒我别被骗,别干一些违法的勾当,只能这么说”(被访者 ZG-YL-B)。

家庭指导的欠缺使得生活困难家庭的青少年在职业规划方面显现出明显的随意性,职业目标模糊不清,一方面希望通过自身努力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另一方面又不知道如何获得相关

信息和提高求职技能,这给他们的就业带来一定的困难。(关于未来发展)是我主动找我爸妈表达了一下我自己内心的想法,然后他们也没有给我太多的指导,他们就是说那个(将来)你想干啥就干啥”(被访者 G3-ZJY-Q)。“没有关于(未来)职业的想法……我是走一步算一步那种,到时候再说”(被访者 C3-YYH-B)。(现在想找什么工作?)我现在差不多就三个方面,一是画画,二是我突然就很想去卖茶叶,第三个是学中医,我觉得中医这个事儿很神奇”^①(被访者 ZG-LZ-B)。“就是不是特别明白未来的路怎么走。”(被访者 ZG3-ZXY-B)韩琳对城市贫困家庭第二代“啃老”现象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即贫困家庭的子女除了在教育、就业机会等方面处于相对劣势之外,往往还缺乏一个明确的就业方向,其生活目标相对模糊^[13]。本研究认为,导致这一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贫困家庭父母自身能力的限制,无法对青少年的学业发展和人生规划提供相应的指导和支持,帮助子女超越“最近发展区”,发展出较成熟的计划和决策技能。研究中,有访谈对象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明确提出希望政府能够给予一些帮助。“从大学结束之后走向社会,可能会面临很多选择,所以选择就困难了。如果一个一个慢慢试的话,会碰很多壁,所以我就想看看能不能减少这样的碰壁……希望(政府给予)就是一些关于职业规划方面的,将来到底该怎样发展,选择哪条路走,类似这样的(服务)”(被访者 DZ-TC-B)。

4. 来自家族的社会支持部分地弥补了家庭自身的不足

本研究中,部分访谈对象的家庭与其家族成员之间保持着较好的互动关系,使得“大家庭”成为推动该访谈对象健康发展的重要社会支持系统。“我姥爷教我的最多,比如说他就会根据某件小事,然后他可能会慢慢地牵引,然后引导出一个道理……还有我舅舅影响会大一些”(被访者 C1-HJY-G)。“大家庭”的成员不仅为生活困难青少年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支持,而且在学业发展、就业、生涯规划等方面也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意见和榜样。“跟姑姑走的很近,比如说我姑姑知道我爱吃红烧肉,她做好了,就给我妈打电话让我过去拿……小姨交往也比较多”(被访者 ZG3-GRL-B)。“影响大的一个是我大大,就是我爸的哥哥,是对我影响很大的,因为有很多时候是我大大过来找我聊……我们是一个大家族,包括我奶奶也是特别关心我……我大大是国家干部,他跟我谈了很多,最后我选择了汽修这个职业”(被访者 DZ-TC-B)。可以看到“家族”部分地弥补了贫困家庭父母社会支持的不足,促进了青少年的发展。但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生活困难的家庭都能够拥有这种和谐的“大家庭”,并由此获得相应的社会支持,在被访对象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青少年表示没有重要的亲戚能够提供这样的支持和帮助。

总而言之,本研究认为,家庭是生活困难青少年最重要的社会支持系统,它不仅满足了青少年发展所必需的基本物质需求,而且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情感支持。不过,由于经济条件和自身能力的限制,生活困难家庭的父母所提供的社会支持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和教育期待较低、对子女长远规划的支持和指导不足,即认知支持不足等方面。在当前教育资源短缺、教育机会不均等的情况下,生活困难家庭这些方面的欠缺可能进一步加大青少年在教育、就业方面的竞争劣势,阻碍生活困难青少年向上流动。

(二) 社会系统为生活困难家庭青少年提供了部分社会支持

1. 以满足青少年基本生活需求和教育需求的行动支持为主

研究发现,在现有的政策体制下,社区居委会作为正式的社会支持系统,是国家低保救助政策和救助资源向贫困青少年传递的终端环节,针对生活困难家庭青少年的工作内容以满足基本生活和教育需求的物质支持为主,如协助生活困难家庭中的学龄青少年进行奖学金申报、为低保家庭青少年发放生活补贴和教育物资等。例如,被访者 ZG3-GRL-B 表示:“社区这边申

^① 以上三个就业方向,该被访者都没有过相关学习经历,就是一种天马行空的想象。

报奖学金,每年这个姐姐(社区团委专干)都会特别努力地帮我申报……特别感谢姐姐。”另一位受访者 X4 - XYN - G 则表示:“社区有很多活动和物资、书籍之类的,还有补课卡(社区在补习机构买到,然后发到帮扶对象手中)。”受访者 DZ - TY - G 也表示:“小张阿姨(社区工作人员)一般找工作,她肯定就先会想着我,就是她如果有信息的话,会先告诉我,所以说都挺照顾的。”可见,社区居委会工作者为生活困难家庭青少年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支持,缓解了他们面临的经济压力和由此带来的学业及生活负担,保障了青少年发展的基本物质需求。

2. 通过社会服务活动提供部分的情感支持和认知支持

研究发现,一些生活困难家庭青少年通过参与社区、共青团和其他社会组织的社会服务活动,尤其是志愿服务活动,提升了自我的价值感和满足感。例如,受访者 D4 - ZN - G 表示:“寒暑假就会有一些志愿活动,有时候我也会跟着去。然后(党员)出去社会实践,我觉得也挺有意义的。人不能光接受别人的好,社区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也会去。”受访者 ZG3 - GRL - B 也表示会带领自己的同伴共同参与志愿服务,这令他和同伴感到开心和有意义。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有获得爱和归属的情感需要,希望能够得到社会与团体的认可、接受,并与周围人建立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体验。生活困难家庭青少年在社会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是接受社会帮助的一方,这在无形当中会削弱其自信心,也会增加其与社会的疏离感。通过参与志愿服务,生活困难家庭青少年可以提升自我价值感,增加回馈社会的积极体验,丰富人际交往,从而获得更多的情感支持。

研究还发现,部分生活困难家庭青少年通过参加社区、共青团组织的社会活动,丰富了社会生活,提高了实践能力。例如,受访者 G1 - QY - B 表示:“我现在经常参加(各种活动),如学校的、包括社会上一些公益活动……包括我们演的话剧结束时谢幕的时候,真的就感觉到了那种令人难以言表的自豪与满足感。”受访者 ZG3 - GRL - B 也表示,“通过参与社会兼职活动(如麦当劳打工)使自己更早地接触了社会,看到的人会比他们(同伴)看到的更多”。这些活动丰富了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有助于获得学业和就业的相关信息、建议和指导,为生活困难家庭青少年的能力建设和个人发展提供了一定的认知支持。值得注意的是,生活困难家庭青少年主要是通过家庭成年人与社区发生互动的,那些开放度比较高的生活困难家庭,其子女与社区互动也相应较多,因此所获得的社会支持也比较多。

3. 缺乏针对后义务教育阶段青少年特殊需求的社会支持

由于发展阶段的特点,后义务教育阶段的青少年(16 - 25 岁)在知识积累的同时,还需要进行人生规划,明确将来的生活和职业目标,但是目前的社会服务活动大多适合较低年龄段的青少年,而针对较大年龄段青少年的服务项目比较少。本研究发现,生活困难家庭青少年离开学校走入社会后,尽管处于困境,却很少得到来自社会系统的有效支持。例如,受访者 G3 - LZ - B 表示职高毕业后,他多次实习但都没能成功就业,对于未来很迷茫。面对就业困难,他表示自己“是一个自尊心特别强的人,基本上靠朋友,没有得到来自社区和社会的支持,平时就是关上家门……(社区的事)基本上都不知道了,很少与外界接触”。另一位受访者 DZ - TY - G 从 2016 年大专毕业后,陆续做过一些兼职,几经面试,但是都没有获得工作机会。尽管社区尝试为其提供了一些求职机会,也都没有成功。这两位受访者都表示愿意学习,希望提升自身能力,但是却不知道该如何提升自我,如何寻找新的工作机会。总之,对于那些毕业后长期处于失业状态的青少年而言,特别缺乏有效的指导和充分的社会支持。

4. 家庭是青少年获取社会系统支持的重要中介

研究发现,家庭是生活困难家庭青少年获取家庭外社会支持的重要中介,也是社会政策传输的主要途径。那些较低年龄(高中以下)的青少年通常对社会政策和家庭接受救助的情况了解得较少,一般是通过家长获得有关社会服务活动的信息。“一点都不了解(社区帮扶这一块),社区居委会都是跟我父母联系,没联系过我”(受访者 C2 - ZRY - B)。“认识一些社区里

面的工作人员……社区有事一般都是找我奶奶……不知道社区里面有什么(课外活动),奶奶说了,我一般也不参加,就是在家写作业”(被访者 C1-TJQ-G)。年龄较大的青少年往往对家庭的经济情况有更清楚的认识,对相关政策的了解,不过他们与正式社会支持系统之间的联系依然很少,主要还是通过家庭成年人与社区发生互动。那些开放度比较高的生活困难家庭,其子女与社区互动相应较多,因此获得的支持也比较多。“社区(居委会)过年过节会发些东西,都是跟我妈联系,其他不太清楚,因为我家主要还是我母亲跟社区联系”(被访者 C3-YYH-B)。(关于教育救助)这个信息是办廉租房的时候知道的,当时有一个阿姨也是低收入者,后来跟我妈随便聊起这些事情,我就知道了……(关于救助政策)这个我没看到过,听我妈说居委会好像有公告,有这方面的介绍,只是我没有去注意这些东西”(被访者 DZ-TC-B)。

另外,调研还发现,生活困难家庭的成员在争取社会系统的支持方面,总体是比较被动的。访谈中,大多数的青少年反映家长们很少会主动跟居委会联系,都是社区工作人员打电话通知他们办理相关事宜。“社区还是挺好的,就是经常给(我爸爸)打电话,有什么好事都会跟他说,挺上心的……我爸爸平时不会去问这些,一般都是人家给他打电话,他就去”(被访者 DB-ZN-G)。

总而言之,本研究发现,现有的社会系统为生活困难家庭青少年提供了一定的社会支持,主要体现在行动支持(如生活补贴、教育救助等),也包括一部分的情感支持和认知支持(如社会实践机会等),但是帮扶内容相对单一,以满足基本生活和教育需求的实际支持为主,缺乏对青少年教育、就业、长远规划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帮扶对象低龄化,社会服务活动以学龄青少年为主,缺乏针对后义务教育阶段青少年的教育、就业、社会融入等方面的社会支持;帮扶方式单向化,主要依赖家庭实现政策传输,青少年缺乏在低保政策传递和反馈过程中的主动参与。

三、讨论与建议

已有的研究显示,家庭经济贫困并不直接决定青少年的发展结果,而是通过父母的压力、投入和支持行为对青少年的身体、认知和社会发展产生影响^[14]。而良好的社会支持对个体发展有着积极作用,可以提高困境青少年的抗逆力。本研究发现,对于生活困难家庭青少年来说,家庭是其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也是其接受其他社会支持的主要中介。从社会支持的内容来说,来自家庭的支持主要涉及行动支持和情感支持;而来自社会系统的支持则主要是行动支持,如经济补助、医疗救助、教育帮助等,基本满足了青少年对日常生活照料的需要和教育需求。不过,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系统,对生活困难家庭青少年的认知支持都存在明显不足,尤其缺少对青少年人生规划、学业发展、求职就业等方面的认知支持和指导。通过对生活困难家庭青少年社会支持状况的分析,本研究认为,共青团针对生活困难家庭青少年的帮扶工作应该以青少年的发展需求为导向,着力打造家庭、社区、学校、社会相互协作的青少年社会支持服务体系,弥补贫困家庭在社会支持方面的不足,促进青少年的积极发展。

(一) 开展家庭支持计划,提升生活困难家庭自身的社会支持能力

大量的实践和研究证据显示,贫困本身并不能直接决定青少年的发展结果,苦难也可以成为个体前进的强大动力,关键在于父母在养育子女过程中的投入和养育行为。本研究发现,大多数生活困难家庭的父母都很关心孩子的成长,并尽力给予孩子温暖和帮助,但也存在一些养育观念和养育行为的误区。如对子女的教育期待偏低、教育方法单一、缺乏长远规划意识等。因此,共青团在开展帮扶工作时,可以将提升生活困难家庭父母的亲职能力作为重要路径,通过加强家庭对青少年的认知支持、情感支持和行为支持,促进青少年的发展。例如,共青团可以协助社区基层工作者,为生活困难家庭的父母提供学习机会,帮助他们认识青少年的身心发展特点,了解更先进的

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并提供相应的教育咨询服务,从而提高生活困难家庭的父母提供认知支持的能力。再如,共青团可以与学校系统合作,通过创建亲子工作坊、青少年发展小组、亲职教育小组等融娱乐性和教育性活动为一体的社会服务项目,对生活困难家庭的家庭信念系统、家庭沟通模式进行积极介入,提升家庭的抗逆力,为青少年的健康发展建立家庭保护网。

(二) 提供社会教育支持计划 弥补生活困难家庭在教育方面认知支持的不足

本研究发现,由于经济因素和自身条件的限制,生活困难家庭的父母所提供的社会支持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和教育期待较低,对子女长远规划的支持和指导不足。因此,建议共青团可以通过提供社会教育支持计划,弥补生活困难家庭在教育方面的行动支持和认知支持之不足。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某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扶贫先扶智,绝不能让贫困家庭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坚决阻止贫困代际传递。”在国内有关生活贫困青少年的研究中,学者们也一致认为,提高贫困家庭子女的受教育水平,是遏制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手段。但遗憾的是,由于教育资源缺乏,现实中贫困青少年的受教育水平常常不尽如人意。为了提升贫困青少年的教育水平,共青团可以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救助,如招募大学生志愿者提供学业辅导、公益类的教育培训课程、教育基金等方式,为生活困难家庭青少年提供多元化的行动和认知支持。

(三) 建立社会支持平台 弥补生活困难家庭在就业方面认知支持的不足

提供生涯指导和就业支持计划,弥补生活困难家庭在就业方面的行动支持和认知支持不足。本研究发现在生活困难家庭青少年所获得的各种社会支持中,认知方面的支持和指导明显欠缺。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有二:一是家长能力不足,无法提供相应的支持和指导;二是现有的社会服务中比较缺乏针对生活困难家庭青少年的就业、生涯规划等方面的服务内容。本研究认为,共青团可以构建政府、企业、学校三位一体的合作平台,通过组织优秀青年人才为贫困青少年提供就业创业咨询、帮助青少年厘清职业目标、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和实习实践机会等,提升其就业能力;也可以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形式,由社会公益组织为生活困难家庭青少年提供生涯规划、就业支持等服务,帮助生活困难家庭青少年学会长远规划,树立明确的生活目标和就业方向,提高其就业能力。

[参 考 文 献]

- [1] McLeod, J. D., & Shanahan, M. J. (1996). Trajectories of Poverty and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37: 207 - 220.
- [2] Miech, R. A., Caspi, A., Moffitt, T. E., Wright, B. R. E., & Silva, P. A. (1999). Low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Mental Disorders: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Selection and Causation during Young and Adulthoo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4:1096 - 1131.
- [3] 冯晓杭, 张向葵.《城市贫困中学生自豪感、外显自尊与抑郁状态的关系》,载《心理发展与教育》2008年第4期。
- [4] 于明远.《贫困家庭青少年状况调查分析》,载《理论学刊》2007年第1期。
- [5] [11] 李 芬.《贫困大学生就业中的劳动力市场排斥》,载《当代青年研究》2007年第5期。
- [6] 李 强.《社会支持与个体心理健康》,载《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 [7] 李相南, 李志勇.《青少年社会支持与攻击的关系:自尊、自我控制的链式中介作用》,载《心理发展与教育》2017年第2期。
- [8] Higgins, E. T., Kruglanski, A. W. (1996). *Social Psychology Handbook of Basic Principles*.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 [9] 陈友庆, 张 瑞.《留守初中生的社会支持与心理韧性的关系》,载《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3年第9期。
- [10] Caplan G. *The Family as a Support System*//CAPLAN G, KILLILEA M. *Support System and Mutual Help: Multidisciplinary Explorations*. New York: Grune&Stratton, 1974: 19
- [12] Shek, D. T. L. (2004). Chinese Cultural Beliefs about Adversity: Its Relationship to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School Adjustment and Problem Behaviour in Hong Kong Adolescents with and without Economic Disadvantage. *Childhood*, 11, 63 - 80.
- [13] 韩 琳.《城市低保贫困家庭第二代啃老现象》,载《当代青年研究》2006年第1期。
- [14] 理查德·M·勒纳等.《应用发展科学》,张文新,常淑敏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4页。

(责任编辑:邢 哲)